

自序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别去十年曾经大地河山从新整顿，
归来万里只见双湖云树依旧葱茏。

（摘自郑开文题通海县秀山公园清凉台楹联）

郑开文是谁？我也没见过，却是我从年幼起就始终不能忘怀的一个人。最初的记忆来自我的外婆。六十多年前的昆明，物品需用匮乏，生活艰难，我们一家六口人就住在两间出租屋里，一直到“知青”上山下乡前，我都与外婆同挤一张床。闲暇时，她会跟我讲些故事，讲她的一些往事，不经意间，这些故事、往事的主角往往总是同一个人，他怎么留学日本啦，又怎样跟孙中山、黄兴一起闹革命啦。然后是骑着大白马，身着将军服，怎么怎么样地南征北战，文韬武略、神采飞扬、英俊威武。最后总是悲惨的尾声：血洒疆场，马革裹尸还。年幼的我常常在懵懵懂懂中听她说，心里暗想，那些离奇的故事肯定是她编的。或者是英雄美人、白马王子一类情节的翻版，离我家的现实状况相距遥远，根本没有往心里去。到我上初中时，渐渐地知道了些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辛亥革命，也偷偷翻检过那个很神秘的樟木箱，里面的照片、印章、文稿字画塞得满满的，竟然就有几张穿着将军服或骑着高头大白马的照片，有几张赫然写着“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郑开文玉照”“郑开文校长肖像”的字样，正是外婆日夜念叨让我耳熟能详的名字。他目光炯炯看着我，嘴巴也似乎噘着，吓得我盖上木箱就跑。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完全停课，我到妈妈单位里玩，看到走廊过道的两面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黑字白纸的大字报，都是些打倒某某走资派、某某学术权威、叛徒、走狗之类的大字报。转过脸看另外一边，我一下子被上面的大字吓蒙了，那里赫然写着“打倒军阀千金小姐郑某某，打倒封建地主小姐郑某某，打倒反动技术权威郑某某”，都是我妈妈的名字，整整一堵墙壁都是。那些白纸黑字的大字报上还画有红叉、斜杠，乱七八糟画了些大小不等的圆圈，似一些妖魔在飞舞，让我陡生恐惧。

在我心目中，妈妈年轻漂亮，尽管她工作很忙，但是一有时间就会给我和妹妹梳洗打扮，穿上干净的衣服或者裙子，有时还有小皮鞋。头发梳得整齐光亮，别上蝴蝶结，那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在单位里，她是财会能手，思维敏捷，工作认真负责，待人平和，单位里的同事见面都以郑老师称呼她。让我们觉得特别优秀的妈妈，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大军阀小姐、地主小姐呢？要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阵势下，被贴上这样的标签，可不是好玩的，注定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而难以翻身。但是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根正苗红，父亲是云南省特等劳动模范，母亲是单位里的财会技术能手，大哥是解放军军官，大门上贴着“光荣之家”的名牌，似乎比一般人家光彩些。从小学到初中，我学习是比较用功的，小学起就担任过班主席、少先队大队长，初中时任共青团书记。我对自己的能力和家庭不曾有过丝毫的怀疑，以后的高中、大学肯定也会这么一路走下去的。如果这些大字报内容是真的话，我岂不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黑五类子女？我的天空一下子昏

暗了，我乱窜着跑回家，哭喊着问外婆这是不是真的，那个叫郑开文的“大军阀”到底是不是我外公。我所希望的答案没有出现，外婆语气平静地告诉我：郑开文是你的亲外公，他不是大军阀，他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天呐！这是真的！我宁愿相信它是一些电影里虚构的场景，就像电影《红灯记》里李奶奶对铁梅所说的那样。这意外发现简直就是一场灾难，骤然降临在我身上，今后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惨苦，我真不敢去想。但心里的阴影怎么都挥之不去，我时常在睡梦中被恐惧的场景所惊醒。

郑开文到底是大军阀还是对国家民族有功的将军？这个问题，在那个年代是不可能去寻找答案的，它就是悬在我家每个人头顶上方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唯恐回避之不及。为了避祸，外公郑开文遗留的书籍、照片、印章、诗词笔记、字画古董都被焚毁或被抄家遗失了，郑开文的名字就此隐埋在我心底的最深处，从不敢对外人提及。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民国时期的书籍、资料逐渐多了起来，郑开文的名字开始浮现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南京临时政府、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亦出现在孙中山、黄兴、蔡锷、唐继尧等历史专著、追思回忆的文章里，新近陆续出版的各种文史资料中也时常出现郑开文的事迹、函电和档案。

最初的材料来自郑开文的故乡云南省通海县的《通海县志》、玉溪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出版的《郑开文将军传略》《辛亥名将郑开文》《清廉将军郑开文》等书籍文章，对其参加云南“重九起义”、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护国战争，担任云南陆军讲武堂（学校）校长期间的作为略有所反映。但是，综合这些书籍文章所提供的信息，与我外婆、妈妈以及郑氏族人口口相传的信息以及残存遗物和少许材料对比来看，发现许多内容有相互抵触之处，叙述的事件也不尽相同。如郑开文于日本留学归国后调任广西编练新军，继蔡锷后任南宁陆军讲武堂总办（校长）、广西新军模范团督办（团长）；武昌起义后，他参加江浙联军攻打南京，参与成立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备工作，并担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代理军学局局长，筹办了中华民国第一所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这些经历表明郑开文在辛亥革命前后数年，均在广西、江浙等地参加编练新军和进行革命活动，不可能参加云南的“重九起义”。早在1914年5月，与蔡锷、唐继尧等共同谋划，郑开文进入广东龙济光军事集团，担任广东第一混成旅代理旅长和广东陆军模范团副团长，成为护国战争中促使广东独立的重要力量。护法运动期间，郑开文担任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成为护卫孙中山先生领导护法运动的主要军事力量。这一系列发生在民国初期的重大事件中，郑开文都承担着重要责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上述书籍文章都没有提及。

郑开文参加中华民族民主革命活动时期，是我国近代历史上演变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波谲云诡的时期。短短十几年间，跨越清廷崩溃和民国肇立以及国家政权的反复轮替。浓缩了改朝换代的暴风骤雨，包含着能让历史学者、文学家、诗人们热血沸腾的所有元素：光明与黑暗的冲突，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抉择；阴谋与正义，投机与坚守，背叛与忠诚，仇恨与爱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历史阶段能把这些杂色纷呈的思想、观念、行为聚合在一起，演绎得如此纷繁复杂、波澜壮阔。也没有哪一种人像先知先觉的革命党人一样，用自己的梦想和生命，完

美地诠释了这些思想、观念、行为的深邃内涵——呼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郑开文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是中华革命同志会、中国同盟会的骨干成员，更快、更多地获取清政府军事实权是他肩负的特殊使命，需要他隐秘行事，不事张扬，不到紧要关口，决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意图。作为军队将领，南征北战，行踪飘忽不定是他的职业特点，导致云南人以为他是广东人而广东人以为他是江苏人。作为一个旧时代的读书人，他忠厚笃信，谦虚低调，事功而不居，故很少在当时有限的记载中留下完整印痕，以至于他的事迹、贡献，成为民国重大事件的陪衬而可有可无。他本人亦不愿为之作丝毫记录，“盖以为人生得志当见之施行，不当沾沾于笔墨之，是尚也。”仅存资料中的他浮光掠影、只言片语，难怪许多学者、研究者竟然把他忽略了。其实，从清末民初到北洋军阀时代，郑开文的名字常常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革命事迹相联系；与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程潜等风云人物亦称兄道弟。又常常与龙济光、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等军阀大佬联系在一起，在清末民初的许多关键时刻，有时一闪而过，有时盘根纠结，散发着一股神秘气息，每每令人萌生一探究竟的兴趣。

我时常有这样的念头，倘如能回到历史的现场，被官修历史、民撰传记所忽略、所遗忘的郑开文，在当时社会急剧变革的舞台上，实则是顶天立地、叱咤一时的英雄，他对时代贡献之多、对时人影响之大，远非一百年后的吾辈所能尽数领会的。只是他太不走运，历史的误会，机缘的错落，抑或理念的冲刷，在时光的隧道里，仅留下微弱的呐喊，些许模糊的背影，更多时刻则被埋进了历史记忆的杳杳深处。能否重见天日，则完全凭借史学者的运气，或系于突发的灵感、偶然的一瞥。

对于我来说，在老一辈人深沉的思念和追忆中，在故纸堆里的只言片语中邂逅郑开文，实在得益于一种无可替代的血脉传承——我是他嫡亲外孙女！一份沉甸甸的血脉亲缘，便有了一份追寻与传承的责任，使我珍惜每一次在图书资料中与他的名字相遇，对每项史料的钩沉莫不怀着同样念头：对他的生平历史多一些了解，对那个伟大时代的复杂性认识得再深刻些。更想跳出已被正统史学家符号化、概念化的叙事框架，从他的身上，寻找到对于推翻循环轮替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从而尝试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家的大革命、革命者真相的解答与佐证。

正是在这种认知基础上，我笔下的郑开文，不尽是读者已经熟悉了的胸怀壮志、引吭悲歌的形象。他固然是慷慨义士，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曾闪亮登场，名噪一时。但是到了人生大结局，无论从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遭遇失败这个大背景，还是就他个人命运来说，他是个失意者。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被湮没在党派之争和某些人的一私之利的内江中，全败俱伤。他没有为了功利名位而营谋伤神，却陷入他人的权利之争而英年早逝；他一生心境高雅，忠厚待人，勤勉做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却让后人居无定所，落泊凄惨；虽然他的弟子名满天下，却因错综复杂的种种原因而不便再提起曾经锐意改革、建树良多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郑开文；他一生南征北伐，骁勇善战，却惨死在土匪的袭击下。这些令人莫名惊诧的现象，虽然不尽是郑开文个人历史真相的全部，但当它们集合交织在一起时，至少给了我一种警觉，在一些已经习以为常的概念和结论的掩盖下，肯定有一部分被忽略、被无

视、被解构的史实，就像本书内容所揭示的一角，已经在时光的沙尘中沉睡了整整一百年，把这其中的真相挖掘并展现出来，应该是我的责任和担当。

历史学是一片深邃博大的海洋，史学者端赖于家学师承，且需扬帆远航，穷尽心力，才能在万顷碧波中寻珍探宝。我晚年入此行道，犹如划条小船去了无人问津的荒岛，遴选了关于一个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党人、军人的狭窄题材，深感自己缺乏对历史的深厚见识，缺少对文档资料进行精湛处置的能力。我唯一可凭借的就是略微知道些书从哪里开始读，事情从何处着手做的经验。但凡寻觅资料，不弃涓埃；考据事实，不憚其烦；臧否人物、议论事件，力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敢有丝毫侥幸轻取的念头。

客观现实是郑开文生前史料稀少，仅存资料也大多语焉不详，道听途说有之，张冠李戴有之，难辨鱼龙。其参加辛亥革命的丰功伟绩几被湮没，而在身后却屡受人贬低、曲解、诬陷。为了梳理郑开文的生平事迹，我们夫妻两人在历史文献资料的考证和实地考察两方面都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努力。

这个工作的初始阶段是查阅云南省档案馆馆藏《郑开文档案卷》《云南省长公署档案》等民国时期的档案，云南省图书馆馆藏《云南公报》《义声报》《天南新报》等图书资料，以及广泛阅读相关地域的地方志，本省辛亥革命人士的回忆录。曾多次访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及新疆、青海、甘肃、贵州、广西、湖南、上海、北京、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图书馆。力所能及地收集日本、港澳台地区专家学者的出版物，其中包括国民党党史资料，曾经和郑开文在同一地区活动过的同盟会会员、滇军将领、省外滇籍官员等撰写的回忆录、诗歌集、铭文碑帖；并多方面探访郑氏族人和辛亥革命老人进行采访调查。

综合探寻的文档资料表明，郑开文最早参加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时间为1904年12月。“中华革命同志会”的组织者、参与者大都为在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该组织成员在中国同盟会成立时也大多转成了同盟会会员籍，这是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成立的第一个准军事组织，时称“黄兴军事班底”的发轫。因此，郑开文的组织关系是中华革命同志会成员和中国同盟会会员，其政治身份是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为职志的革命党人，当是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

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等典籍中，发现郑开文参与了筹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的档案材料，其时的职务是陆军部代理军学局局长，为云南人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中担任军职最高之人（另有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次长吕志伊，内务部总参议（秘书长）张大义以及云南籍参议员数人）。1912年1月15日，郑开文主持编撰了《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章程》；1912年1月16日，郑开文奉黄兴命令宣布成立中华民国第一所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随后主持编撰了《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等军校管理文件，显然是民国初创时期建立军事院校、进行新时期军事教育的开拓者。

在《云南光复纪要》、上海《申报》、云南《义声报》《天南新报》等旧报刊书籍中寻找载有郑开文统领云南西征军援藏平叛时互为印证的材料，表明郑开文是民国初期为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而浴血奋战的杰出爱国将领。

在研读《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黄兴编年史长编》《黄兴集》《蔡锷集》《辛亥革命回忆录》等书籍、文章以及广州市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的基础上，挖掘出郑开文作为同盟会早期成员，被中国同盟会寄予厚望的军事骨干，长期隐姓埋名地对敌开展政治、军事斗争的艰苦卓绝，又极富智慧谋略的工作经历，其成果对护国战争中广东独立前后曲折复杂的政治、军事格局以及护法运动中南北政权军事、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有着重大影响。

在日本国“北京‘支那’研究会”1918、1921年出版的《中国名人资料事典》第二集、第六集中，载有郑开文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和回国后担任广西南宁陆军讲武堂总办、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代理军学局局长、云南西征军副司令以及尔后一系列职务变化，是解开郑开文生平事迹百年悬疑的关键性证据。

实地调查工作也颇为浩繁。笔者夫妇、儿子沙霖曾经驱车数千公里，沿着当年西征滇军援藏平叛的行军路线，到达云南丽江、香格里拉市（原中甸）、德钦县、溜筒江村、东旺村等地；到达西藏盐井县、察隅、昌都、林芝地区；到达四川乡城、稻城及邻近地区。挖掘出一批有价值的史料和实物，寻找到当年西征滇军凯旋时在德钦县溜筒江村的茶马古道悬崖上刻立的《滇郑开文西征凯旋纪念》摩崖石刻，丽江市黑龙潭公园内刻立的《哀乌斯藏辞并序》石碑，两块碑刻记录了西征滇军将士和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抵御国外势力图谋分裂中国的艰苦卓绝的战斗；记录了西征滇军将士维护中华民族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辉煌战绩。甚至记录了西征滇军左纵队翻越梅里雪山北坡，到达西藏察隅、左贡、波密一带，弥补了这段历史的记忆并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

为考证郑开文镌刻在云南通海县秀山公园海月楼“匹马入楼兰”楹联的事实真伪，笔者两次到达新疆乌鲁木齐、阿勒泰、喀什、若羌（楼兰）、依吞布拉克（石棉城）；青海省茫崖、格尔木、西宁；甘肃兰州等地区。寻找郑开文在1913年间率部远征万里，平息库伦（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当时蒙古属中国版图）叛乱的战事线索和遗迹。

这些资料、档案、文物，对揭示郑开文参加中华民族民主革命，参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为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捍卫民主共和国家而南征北战的历史功绩，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发现郑开文的历史功绩，由于某些人在权力利益以及各种不纯目的和不正当行为驱使下，被湮没、曲解、忽视，甚至被诬名，冤屈百年的沉痛蔽漱。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作者依据确切的档案材料和文物，对历史线索和事件来龙去脉的叙述，肯定会涉及当时代公众人物的褒贬和是非得失的评价。但是，笔者没有必要纠缠那些历史旧账，在漫长的社会进化和价值观念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对公众人物的评价也非一时一事的表现而能定论。当以秉持事件、人物是否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是否推动当时代社会进步和文明为评判标准，客观地再现历史现场的人物与事件的关联，才是本书的根本宗旨。

史料毕竟是史料，先辈们曾经的辉煌和荣耀早已付诸风霜雨雪，烟消云散，实在没有必要再讲些“祖上曾经荣耀”的故事。置郑开文于数千年未有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背景下，来解读他的人生历练、做人做事、社会贡献、人生价值，从而对后辈诸人在社会变革中有可资借鉴的认知和经验，才是本书的初衷。因此，我们愿意把接近信史的这一部分赠予读者，让先辈们的历史

经验成为我们的共同财富。虽然只是一个侧面、几帧剪影，一些曾经脍炙人口的诗联函电，如果爱好史学的读者能从中收获一些新的认知，感到若干新意；抑或认同这种追求真相的求索，则高山流水，吾道不孤也。或许也因为你、你们的先辈前人存有更为精彩的故事等待你去讲述；有更加曲折离奇的经历期待你去挖掘。其中原委不啻是个人的因果得失，而且关乎家族、民族的巨大精神、文化财富，请你与我同行。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四日